

# 略論清帝南巡揚州及其功過

陳捷先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名譽教授

【內容提要】揚州是中國的歷史名城。清朝康熙與乾隆兩位皇帝曾先後十二次訪問揚州，對古城的政經文化都產生深遠的影響。本文作者以為：(一)清帝的密集訪問揚州，使古城市容更新，尤其園林建設，優美出眾。在文化藝術方面也得到進一步的發展，揚州乃成為當時中國文化重鎮。(二)揚州官商為接待皇帝，在建屋修路、演戲擺宴、進呈珍玩等方面花費很多，以致造成巨額虧空。(三)皇帝為給予揚州官員與鹽商們「獎賞」，使他們在政治與經濟上獲得實利，因而官場奔競與貪瀆風氣更盛，鹽政制度也被破壞。(四)皇帝在揚州的奢靡生活，給一般人民起了不良示範，養成大家安於逸樂、不勞而獲的趨利心態。總之，清帝南巡揚州，雖然催化了揚州的經濟發展，文化興盛，古城的知名度提高；但也腐蝕了揚州原本古樸的風氣與人心。

清朝全盛期間，康熙與乾隆兩位皇帝曾經多次藉南巡機會訪問過江南古城揚州。康熙帝在二十三年之中（康熙二十三年至四十六年，一六八四至一七〇七），有六次南巡的壯舉，其中甚至有三次是每隔兩年即到揚州一次的。乾隆皇帝追隨他的祖父之後，在三十二年之間（乾隆十六年至四十九年，一七五一至一七八四），也作了六次江南之行，而每次必到揚州。他們祖孫二人，在一百年當中（一六八四年至一七八四年），前後共十二次駕臨揚州，從時間上看，不能不算是密集的了【註一】。

清朝這兩位皇帝的南巡，確實是有多重目的的。他們除了督導黃、淮河道與海塘等工程之外，在收撫民心、籠絡士紳、整飭吏治、鼓勵文學等方面，也作了不少的貢獻。當然，皇帝們既然到了「端合仙才人住」的揚州，必然會遊覽一番當地的

名勝古蹟，這也是人之常情。皇帝在名城尋幽訪古，小作勾留，地方上的官員與士紳當然要熱烈的接待，以盡地主之誼，以盡臣子之分。尤其在封建的當時，大家都想瞻仰「天顏」，更想得到「聖恩」，踵事增華，鋪張浪費，也是勢所必然的；而這種為「接駕」與「辦貢」的巨額消費，卻為清朝吏治政風與地方財政帶來很多很大的後遺症。此外，也是眾所週知的，清朝的這兩位皇帝都仰慕中華文化，而且他們在這方面的成就也是一般歷代中國帝王不能望其項背的。康熙皇帝多年臨摹名家字帖，有人說他的書法可以媲美董其昌。他又喜愛讀中國古書，直到老年還是手不釋卷，甚至有時「咯血」病了，他也不停止【註二】；在兵慌馬亂的年代，他還是不輟學，因為他相信「學貴有恆」【註三】。乾隆皇帝對中國經史也有高深的造詣，而且是位詩迷，他一生寫過四萬多首古詩，數量之多，超過了二百年唐朝兩千多位詩人作品的總和，連他自己都自滿的認為是「文壇佳話」。這樣的文士型皇帝造訪揚州，顯然會給古城帶來一陣文化旋風的，也會影響到日後的揚州以及江南人民的生活。

康熙與乾隆兩位皇帝的南巡途經揚州以及他們每次在揚州的活動，清朝的官書如《清實錄》中雖有記載，但都不詳盡，除缺失外，又常有隱諱之處，所以不能視為當時真實的記事。例如康熙皇帝第一次南巡時，有關他在揚州的史事，《清實錄》只記載了他們一行於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年）十月甲寅日（二十二）「御舟過揚州，泊儀真江干」，第二天「乙卯，御舟自儀真渡揚子江，泊鎮江府西門外」。後來皇帝就去了南京，謁明太祖陵墓，巡視江寧教場。在同年十一月回程北上時，皇帝於初五日「駐蹕儀真」，初六日則泊舟在揚州府轄的一個小鎮叫邵伯的地方，然後即北上返京了【註四】。從以

【註一】：康熙皇帝曾於康熙二十三年、二十八年、三十八年、四十二年、四十四年與四十六年先後六次南巡。乾隆皇帝的南巡則分別於乾隆十六年、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四十五年以及四十九年舉行。

【註二】：《國朝先正事略》卷首曾國藩〈序〉中稱：康熙皇帝「年十七、八時，讀書過勞，至於咯血，而不肯少休，老耄而手不釋卷。臨摹名家手卷，多至萬餘。」

【註三】：《大清聖祖仁皇帝聖訓》卷五〈聖學〉，頁一。

【註四】：《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一一七，葉九至二十。

上的記事中，很多人一定會以為康熙皇帝在這次南巡路上根本沒有進揚州這座名城，更談不上有其他的活動了。然而根據清宮大內珍藏的《康熙起居注》資料，我們發現事實並非如此，皇帝不但進入了揚州城，而且在城裡還有不少活動，因為該項檔冊在是年十月二十二日條下記為：

「…上至揚州，登覽蜀岡棲靈寺、平山堂諸勝，御書『怡情』二字，留題於平山堂。至天寧寺，御書『蕭閒』二字。……」【註五】

《起居注》是第一手史料，是皇帝生前就寫製成書的，與《實錄》在皇帝死後才編纂的情形不同，內容的可信性應該是更高的。就康熙皇帝第一次南巡一事來說，顯然皇帝在南下途中是到了揚州，而且還進城遊覽了幾處名蹟，特別記錄了棲靈寺與平山堂。棲靈寺是一座古剎，本名大明寺，因寺內有棲靈塔聞名，加以清朝君臣不愛用「大明」字樣，故改稱棲靈寺。這一名寺興建於南朝宋大明年間，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宋朝大詩人陸游讚譽此寺為「淮東第一觀」，是揚州的最著名古蹟之一。平山堂是北宋名家歐陽修任揚州太守時所建的，他常在此與文士們歡宴集會。曾經「揮毫萬字，一飲千鍾」過，後人在此作詩憑弔的很多。天寧寺也是揚州的名寺，康熙皇帝其後幾次訪問揚州時，曾於此寺留宿，乾隆南巡時，更喜歡駐蹕天寧寺。至今在寺前數十步地方仍有「御馬頭」一處，是當日專為皇帝登舟用的。《起居注》裡既然記了皇帝遊覽了這些名勝，又題了「怡情」、「蕭閒」等墨寶，顯見皇帝是上岸進城了，《實錄》缺載這些史事當是事實。《起居注》又記康熙皇帝在同年十一月初四日「自江寧回鑾」，初五日「駐蹕儀真」，初六日「駐蹕邵伯鎮」，沒有再在揚州城裡勾留【註六】。不過，康熙對揚州的印象似乎愈來愈好，尤其是最後兩次南巡，都在揚州留住超過十天，比起第一次只待了一天顯有不同了。【註七】。

乾隆皇帝南巡揚州的情形也是一樣，《清實錄》裡多只記「是日，駐蹕高旻寺行宮」、「駐蹕天寧寺行宮」或「駐蹕天

【註五】：《康熙起居注》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條（北京中華書局版，第二冊，頁一二四三）。

【註六】：同上書，第一二四九至一二五〇。

【註七】：《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二一九，葉十四、十六；卷二二〇，葉十二至十五；卷二二八，葉二二至二三及卷二二九，葉一至十四等處。

寧寺行宮，翼日如之」等等的簡略文字，最多也僅能從中得悉乾隆皇帝在天寧寺留宿的時候為多。另外，在揚州也有時「賜扈從王公大臣並江南大小官員等食」，其他的活動內容就一概不見記載了。事實上，我們在《乾隆起居注》、《南巡盛典》、《兩淮鹽法志》、《重修揚州府志》、《揚州畫舫錄》、《浪跡叢談》、《履園叢話》、《水窗春曉》等官私書檔之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很多乾隆皇帝在揚州六次遊歷的情形。就以皇帝為表示自己才藝過人而在遊覽時更改寺廟與花園名稱一項來說，便有以下多起：

乾隆十六年，賜「舍利禪院」新名為「慧因寺」。

乾隆十六年，賜「福國寺」新名匾額「福緣寺」。

乾隆二十七年，賜江春私人亭園「江園」新名為「淨香園」。

乾隆二十七年，賜黃履暹之亭園為「趣園」。

乾隆二十七年，賜汪玉樞之亭園為「九峰園」。

乾隆二十七年，賜「蜀岡朝旭」新名為「高咏樓」。

乾隆三十年，賜徐士業私家亭園名為「水竹居」。

乾隆三十年，賜汪立德等所建園林名為「小香雪」。

乾隆三十年，改「大明寺」名為「法淨寺」。

另外，改「大洪園」為「倚虹園」；改「吳園」為「錦春園」以及「江氏東園」為「熙春堂」等等，也是乾隆皇帝在南巡揚州時的傑作。上述資料之中，也有記皇帝遊「九峰園」時，發現園中太湖峰石「玲瓏嵌穴，穹穴千百」，甚為喜愛，乃降旨「選二石入御苑」，時人曾有詩詠此事云：「名園九個丈人尊，兩叟蒼顏獨受恩。」【註八】而平山堂一地乾隆皇帝所賜的墨寶與所作的詩文則更是很多【註九】，在在說明了當日乾隆皇帝確實在揚州遊歷了多處名勝，絕不是《實錄》書中所

【註八】：李斗《揚州畫舫錄》，卷七《城南錄》。

【註九】：乾隆皇帝在平山堂以及堂西的「御苑」中留下的紀念詩文很多，如在平山堂前後共題詩數十首，並賜對聯：「詩意豈因今古異」「山光長在有無中」。另在御苑現仍存康熙、乾隆遊平山堂碑，刻載其詩文多件。

記的寥寥數語所能透現的。

《清實錄》中不但缺載當年兩位清朝皇帝遊揚州的瑣事，更隱諱了有關皇帝遊揚州而產生的政治與經濟上的嚴重問題。現在就以這方面的事作一簡述：

不論是康熙南巡或是乾隆南巡，皇帝都確實三令五申的降諭說不許苛擾百姓，一切費用都由政府負擔。例如康熙二十三年首次出巡時便對戶部下令說：

「……一應沿途供應，皆令在京所司儲備，毫不取之民間，猶恐地方官役，不能悉體朕懷，借端支應，妄行濫取，今特加申飭，如有悖旨私徵，一經發覺，定行從重治罪。……」【註一〇】

乾隆時代也是一樣，不但在第一次南巡前就諭令各地官員「力戒紛飾增華」，同樣的也聲稱：「所有行營供頓悉出內帑。」甚至在第二次南巡時更再次提醒各官員說：

「……前者巡幸南省時，屢飭各督撫務從簡樸，而所至尚覺過於華飾，喧湑耳目。此次行宮及名勝憩息之地，悉仍舊觀，但取灑掃潔除，概無得增一椽一瓦，毋陳設玩器，城市經途，毋張燈演劇，踵事增華，巡覽所及，各省督撫等果能綏緝井疆，康乂蒸庶，俾人敦禮讓，俗慶盈寧，朕自深為嘉悅。若其徒事華靡，致飾觀美，耗有用之財，侈無益之費，適以自滋咎戾，其無取焉。……」【註一一】

惟恐各地官員不能遵辦，乾隆皇帝在上引諭旨頒降後不到一個月，即乾隆二十二年七月初，又發出另一道命令，語氣更堅定而嚴厲的說：

「朕時巡江浙，已屢降旨，令該督撫等，毋事浮靡，務從簡樸，並飭禁一切商捐陋習。乃聞前次南巡時，浙省辦差，至有當商捐費者，此斷不可，著再行曉諭，嚴加禁止。……再所過城市民居，因迎候鑾輿，各出誠敬之意，於其門前香燈懸綵者，自可不禁。其行宮陳列玩器，蘇揚城郭衢街間，張設幔柵，已有旨禁飭。至沿途水次，從前俱設燈船戲船

【註一〇】：《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一一六，葉二七上。

【註一一】：《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四九〇，葉三十一至三十二。

台閣、俚俗遊玩之具，此不過地方吏役及民間游手好事之徒，藉名苛斂，尤當通行嚴禁，該督撫等其凜遵無忽。」【註一二】

皇帝雖然一再諭示「毋事浮靡」，但大臣們仍是視為具文。加上皇帝也不認真執行禁令，甚至還接受鹽商報效的幾百萬兩銀子作南巡「賞賚」之資，並認為是商人「踴躍急公」的敬意表現。皇帝既然默許了，大臣間當然就爭競的「誇多鬥靡」，奢侈風氣也就愈來愈烈，揚州一地的情形也不例外，事實上尤甚於其他城市。現在就以下事例作為說明：

皇帝要在揚州作勾留，行宮的整建是必需的。根據可靠的資料，高旻寺行宮與天寧寺行宮先後被裝修得很華麗，也耗費了巨金。康熙皇帝第一次到揚州時住在「御舟」上，顯然與行宮的環境不佳有關。康熙三十八年第三次南巡時，因為有皇太后同行，他們一行在高旻寺看到茱萸灣的古塔「歲久寢圯」，皇帝為了表示孝心，「欲頒內帑略為修葺」，不料揚州的鹽商們「以被澤優渥，不待期會，踴躍赴功，庀材協力，惟恐或後，不日告竣」【註一三】。事實上，鹽商們這次捐銀固然有自動「赴功」的；但皇帝確也下令「命鹽商修建」，官方史料就提到過這件事【註一四】。茱萸灣在古代又稱臨灣坊，是沿運河東行通海、北上淮泗的必經之路。隋煬帝三下揚州，都是在茱萸灣上岸的，因當地遍植茱萸而得名。茱萸灣畔的高旻寺原名中天寺，康熙皇帝因此次重修高塔而賜名高旻寺。在現存的《康熙起居注》中，記皇帝第三次到揚州時曾賜御書給鹽商張文秀與項起鶴二人的母親，可能與這些鹽商出資修塔有關【註一五】。至於鹽商與皇帝南巡更進一步發生關係，顯然又與當時任職兩淮鹽政的曹寅有關。曹寅曾在康熙六次南巡中先後四次迎送過皇帝，尤其在第四、五次之間，他為皇帝重修了高旻寺行宮，表現得很好。現據清宮檔冊，可知康熙皇帝於四十二年南巡返京後一年多，又興起了再訪江南的念頭。曹寅得悉消息，為逢迎皇上，便暗中召集相關官員與鹽商，合力捐銀，大興土木，建造茱萸灣（或稱寶塔灣）行宮。曹寅在康熙四十三

【註一二】：同上書，卷四九二，葉五至六。

【註一三】：見康熙皇帝自撰《高旻寺碑記》，碑文在揚州諸家所作的方志中均有載錄，高旻寺中至今仍有石碑。

【註一四】：見《關於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頁三十（北京中華書局版，一九七五年）。

【註一五】：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康熙起居注》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條。

年十二月初二日，給皇帝上的奏摺裡提到：

「……所有兩淮商民頂戴皇恩，無由仰報，於臣寅未點差之前，敬於高旻寺西起建行宮，工程將竣。群望南巡駐蹕，共遂瞻天仰聖之願。……」【註一六】

第二年，皇帝第五次南巡路過揚州，在三岔（汜）河上岸，對於這座「御花園行宮……龍顏大悅」【註一七】。高旻寺旁的行宮據清代作家的描繪，「初為垂花門，門內建中、前、後三殿，後照房。左宮門前為茶膳房，茶膳房前為左朝房，門內為垂花門、西配房、正殿、後照殿。右宮門入書房、西套房、橋亭、戲台、看戲廳。廳前為闌子亭，亭旁廊房十餘間，入歇山樓。樓後石版房、箭廳、萬字亭、臥碑亭。歇山樓外為右朝房，前空地數十弓，乃放煙火處。……」【註一八】可見規模不小。至於高旻寺行宮究竟花費了多少興建費用，目前因無足夠史料，確數不得而知；不過，據曹寅的報告，他與李煦各捐了兩萬兩銀子，李燦捐銀一萬兩；另有鹽商多人出貲捐建，曹寅以「各商出銀數目，尚未結算」為由，一直未向皇帝報告。總之，建築總數必然是很可觀的，不然後來絕不會有人寫詩說出：「三汜河干築帝家，金錢濫用比泥沙」的話來了【註一九】。

揚州城郊離風景區較近另一座行宮是天寧寺行宮，康熙皇帝駕臨的時間較少，乾隆皇帝則在此勾留的時間為多。這座行宮在康熙末年就已經奉旨修理了，當時官員們也捐錢助修，據說一次小修就花去了商捐銀一萬四千兩【註二〇】。天寧寺是揚州八大叢林之首，東晉時就有尼泊爾高僧佛馱跋陀羅在此譯過《華嚴經》，到北宋政和年間才被徽宗皇帝賜名為「天寧寺」。其後數百年間，各界人士不斷捐款構造殿宇，營建園林，到清代已是規模大具。乾隆之世，由於皇帝喜歡留住於此，

【註一六】：見《關於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秦摹高旻寺碑文摺）。

【註一七】：《聖祖五幸江南全錄》，康熙四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條。

【註一八】：李斗《揚州畫舫錄》，卷七《城南錄》。

【註一九】：張符驥《張海房先生自長吟》卷十。

【註二〇】：《李煦奏摺》，頁三八四、第三九七號摺。

官府及鹽商們都助捐整修過，天寧寺中本來就有一個著名的園林叫西園，後來又在寺西闢了一個乾隆行宮中的御苑，「苑中有大觀堂，其旁有御書樓，樓上額曰『文匯閣』。樓下懸御書『東壁流輝』匾額。樓外碧水環之，爲卍字河。右爲修廊，前爲御碑亭。四周栽花植木，疊山疊石，一番御苑莊重氣象」【註二一】。

皇帝居住的行宮，除了建築宏偉以外，內部陳設也應該是很講求的。康熙皇帝初到曹寅等人爲他整建的高旻寺行宮時，看到「御花園行宮……添設舖陳古玩精巧，龍顏大悅」。乾隆皇帝的天寧寺行宮則更加奢華了，甚至降諭旨准許陳設玩器，像書籍、字畫、端硯、掛屏、大小穿衣鏡、磁瓶、香爐等等，一應俱全。官員們爲取得皇帝歡心，陳設物品儘量選覓稀世珍品，由總督、巡撫各二十件，按察使、布政使各二十件、道員十五件、各府十二件、州縣官各十件向人「借用」來，放在行宮之中【註二二】。當然，還有各地方官員送來的特產品，更是玲瓏滿目，應有盡有的。

康熙皇帝到揚州被官民迎接的情形目前我們知道的還不多；不過乾隆帝駕臨這座古城時，有人作了如下的文字記述：

「高宗第五次南巡時，御舟將至鎮江，相距約十餘里遙望岸上，著大桃一枚，碩大無朋，顏色紅翠可愛，御舟將近，忽煙火大發，火焰四射，蛇掣霞騰，幾眩人目，俄頃之間，桃杳然開裂，則桃內劇場中峙，上有數百人，方演壽山福海

新戲。彼時各處紳商，爭炫奇巧，而兩淮鹽商爲尤甚。……」【註二三】

有人說乾隆南巡所經路線與在揚州一地活動情形，多仿「聖祖（按即康熙皇帝）南巡例也」【註二四】，可見康熙自高旻寺行宮興修之後，在寶塔灣一帶登陸時，必然也受到類似的歡迎情景。如此豪華的接迎場面，花費一定很多，難怪《紅樓夢》裡借趙嬷嬷之口講出「好勢派」，「別講銀子成了糞土」一類的話來驚嘆南巡的盛況了【註二五】。

【註二一】：朱江《揚州園林品賞錄》，頁六七（上海文化出版社，一九八四年）。

【註二二】：見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南巡差案章程》。

【註二三】：徐珂《清稗類鈔·巡幸類》（高宗南巡供應之盛）條。

【註二四】：李斗《揚州畫舫錄》卷一。

【註二五】：曹雪芹《紅樓夢》第十六回。

皇帝在揚州期間，必然要遊覽名勝古蹟，御蹕臨幸的道路與景點，當然就必得作一番整頓與修葺。據揚州當地的一些資料，可以看出兩淮鹽商曾專開了一條新的河道，從城外東北的香阜寺直達新城天寧門行宮，以便皇帝輕舟臨幸。另由天寧寺行宮經天寧街、彩衣街、前三司鋪、教場、轅門橋、多子街、埂子上、出鈔關、花覺行至鈔關碼頭，一路擴大整修，作為新城御道，為供邀宸賞，「堰石清道，如鋪沙藉路之例」【註二六】。而「道旁或搭彩棚，或陳水嬉，共達呼嵩誠悃」【註二七】。據說乾隆皇帝也覺得如此整治張羅，實在有些「滋靡費甚」了【註二八】。事實上，還有不少鹽商，做了一些修橋鋪路的工作，顯然也是為迎接聖駕光臨的。如馬曰瑄修廣儲門至便益門一帶的大路；汪應庚修建古雷塘石橋；羅綺築城外石碼頭；鮑志道重修康山至鈔關與小東門一帶道路；另有人出錢疏浚舊新二城中的古井等等，都是因為揚州城裡「地勢卑濕，淫雨積潦，溝亦易淤」的緣故【註二九】，整修了當然會給皇帝好印象的。

天寧寺行宮離瘦西湖風景區很近的，為了便利皇帝遊湖，揚州官紳們又刻意的裝飾與修治道路與若干景點。他們先把行宮外的御碼頭鋪上「棕毯……御道用文磚，亞次暫用石工」【註三〇】，既安全又美觀。皇帝登舟到名聞遐邇的風景區平山堂所經過的瘦西湖河道，原先叫保障河，亦稱炮長河，全長約六華里，本是揚州古城的護城河，用以與古運河相通的水道，自隋唐以來就隨著城址的變遷，時有變化。袁枚曾經說此「長河如繩，寬不可二丈許」【註三一】，自康熙皇帝南巡之後，鹽政官員便「周回故址，擴而疏之，更為鑿其斷港絕潢，使欸乃相聞，迤邐以至於平山之下」。又在沿河兩岸植柳種桃，以「壯郊原名勝之觀」【註三二】。尤其到乾隆二次南巡之後，當地官員又鑿蓮花埂，浚河道直通平暢，因而保障河畔，笙歌

【註二六】：李斗《揚州畫舫錄》卷九《小秦淮錄》。

【註二七】：同上書，卷一《草河錄》。

【註二八】：徐謙芳《揚州風土小記》稿本（現藏揚州市圖書館）。

【註二九】：嘉慶《兩淮鹽法志》卷五六《雜記》、卷四六《人物五》等處。

【註三〇】：同【註二八】。

【註三一】：李斗《揚州畫舫錄》卷首《序》。

【註三二】：趙之璧《平山堂圖志》卷九，《藝文七》。

竟日，畫舫雲集，可與杭州西湖比美了。詩人汪沆有詩認為杭州西湖與揚州保障河同為「銷金鍋子」，即「買笑千金」的所在，「故應喚作瘦西湖」，從此這條護城河也就以「瘦西湖」名聞全國了。

湖上的風景點與古蹟很多，地方官紳先後做了不少的翻修與建造，以下幾處，可作說明：

在瘦西湖口，有一座古橋，建於明末崇禎間，本為木橋，因圍以紅欄，故名紅橋。乾隆以後，先後經郎中黃履昂改建石橋，巡鹽御史吉慶、普福、高恆相繼重建，於橋上加蓋橋亭，「如垂虹下飲於澗」，遂改名「虹橋」。虹橋的有名不僅在它的造型以及佔有湖口的優良位置，主要的還是因為會有不少名人，如孔尚任、王士禛等人在此與詩人集會，舉行過多次大規模的「虹橋修楔」，最大的一次虹橋修楔即在乾隆間，兩淮鹽運使盧見曾（雅雨），效法前賢，作七律四首，唱和者竟多達七千餘人，編成三百多卷詩冊，一時傳為佳話【註三三】。乾隆皇帝也在此撩起過詩興，寫下不少首詩，欣賞「綠波春水飲長虹」的美景。

在瘦西湖中有「梅嶺春深」一景，四面環水，嶺上有關帝廟、玉版橋、嶺上草堂、觀音殿、六方亭、釣渚等名勝，都是在乾隆朝先後重修與興建的，與皇帝的到訪有關。

五亭橋更是瘦西湖中著名景點，這座橋原先因建造在蓮花埂上而以蓮花橋為稱，乾隆二十二年巡鹽御史高恆增建為五亭橋，人來橋上，如登高閣。橋基呈「工」字形，上有五亭，下支四翼，正側有橋洞十五。傳說每當「月滿時，每洞各銜一月，金色滉漾，眾月爭輝，莫可名狀」【註三四】。

在五亭橋北岸，又有「白塔晴雲」一景，其實「白塔」是建造在南岸蓮性寺內的。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年），兩淮鹽總江春集資仿照北京北海白塔模樣，就舊塔基改造成一座喇嘛塔。儘管《揚州畫舫錄》中也說：「仿京師萬歲山塔式。」但是瘦西湖的白塔不及北京的高，不如北京的寬，以柔美見長，而且發揮了磚刻的特長，塔座全是磚雕的束腰須彌座，座為八角四面，每面有十二生肖的磚雕，象徵一年十二月，一天十二時辰。築台五十三級，象徵童子拜觀音的五十三參圖。中為

【註三三】：李斗《揚州畫舫錄》卷十《虹橋錄上》。

【註三四】：同上書，卷十四。

塔身，內供白衣大士像。上有層級「十三天」，象徵天的最高處。塔頂用鑲金，作寶瓶形式，極富美感，也是當時揚州紳商為迎合乾隆皇帝好西藏喇嘛教的心理而建造的。

乾隆初年，鹽商汪應庚在大明寺內建造了「西園」，後改稱「御苑」，也是專為皇帝來遊幸而設計的。這座西花園本來就極具人文景觀，山水安排的很好。蘇東坡曾有詩讚賞說：「萬松時灑翠，一澗自留雲。」康熙以後，官商們為接待皇帝，更增修園內的廳、館、亭、台、樓、閣、榭、廊，並使之成為伏羲式的園林，富有濃郁的藝術和諧之美。乾隆皇帝每到揚州必來此地遊覽，不少詩作都確顯現了這位帝王對此地流連忘返之情。目前該園尚存有康熙與乾隆碑亭，陳列著他們當年的詩文作品。

除了上述的大景點以外，還有很多較小的寺院、橋樓等建築也是在清朝盛世期間整建裝修的，由於篇幅所限，不能一一贅述。又根據可靠資料，康乾時代，揚州城裡城外，處處有園林，官屬的、廟屬的、會館、宗祠屬的、書院、茶房屬的以及私家住宅屬的，比比皆是。尤其是殷富的商人，他們在乾隆時代，為供邀宸賞，取得皇帝的歡心，不惜重金，廣延名家到揚州來為他們的園林「創稿」，力圖將全國各地的風景區都匯集到揚州一城，因而像小秦淮、小金山、觀音山、桃花塢、小五台、小九華等等的名稱都出現在古城內外了。《兩淮鹽法志》也記：清帝南巡時期，揚州城外名勝二十六處，共三十九個風景點，「率皆商人自修其業，供奉宸游之所」【註三五】。同時也因為清帝駕臨揚州，古城的若干私家園林有從城市擴展到湖上的趨勢，如瘦西湖南岸的賀家東園，北岸有卞氏與員氏家園，大虹橋西岸有冶春園，瘦西湖尾有王洗馬園、平山堂西有程家的筱園等等。因此乾隆年間屈復說他在康熙中期來揚州「登平山堂，北郭園林，連錦錯繡。惟關壯繆祠外，荒園一區，古杏二株，扶疏於雲日。叢篁竊密，荆棘森然」。可是到乾隆朝他再訪揚州時，湖區的景色大變，「蕪者芳，塊者殖，凹凸者因之而高深，游人摩肩繼踵矣」【註三六】。《浮生六記》的作者沈三白也曾於乾隆四十八年（一七八三年）應聘到揚州，他對瘦西湖區美景也寫下了一些當時的實況：

【註三五】：嘉慶《兩淮鹽法志》卷四《恩幸五·行宮》。

【註三六】：賀君召編錄《揚州東園圖咏》，屈復《揚州東園記》。

「……平山堂離城約三四里，行其途八九里，雖全是人工，而奇思幻想，點綴天然，即閩苑瑤池，瓊樓玉宇，諒不過如此。其妙處在十餘家之園亭，合而為一，聯絡至山，氣勢俱貫。」【註三七】

清朝有人作詩形容當時湖景有「兩岸花柳全依水，一路樓台直到山」句，與沈三白所說是相同的。難怪劉大觀在當時也說：「杭州以湖山勝，蘇州以市肆勝，揚州以園林勝，三者鼎峙，不可軒輊。」【註三八】揚州「以園林勝」確實與清帝南巡有關，當然如此「大構架、興宮室、建園池、營台榭，屋宇相連，矗似長雲」的大興土木，使得揚州城裡城外，面貌一新，建設得更更好了。

清朝官書裡不但對以上皇帝訪問揚州的行程以及揚州官紳商賈們接待、花費等等事實缺乏忠實記載外，對於皇帝在揚州的吃喝玩樂更有隱諱之嫌。從《聖祖五幸江南全錄》與《南巡盛典》兩份史料中，我們不難看出當時兩位皇帝在揚州生活的情形一斑。例如康熙四十四年第五次南巡到揚州，《聖祖五幸江南全錄》中就有不少有關的記述：

「三月十一日晚，由高郵、邵伯抵揚州黃金壩泊船。有各鹽商匍匐叩接，進獻古董、玩器、書畫不等。

十二日，皇上起鑾乘輿進揚州城，總漕桑（按指桑格）請聖駕往炮長河看燈，俱同往平山堂各處遊玩。：皇上過鈔關門上船，開抵三汊河寶塔灣，船泊，眾鹽商預備御花園行宮，鹽院曹（按指曹寅）奏請聖駕起鑾，同皇太子、十三阿哥、宮眷駐蹕，演戲擺宴。：：晚戌時，行宮寶塔上燈如龍，五色彩子舖陳古董詩畫，無計其數，月夜如晝。

十三日，皇上行宮寫字，觀看御筆親題。

十四日，皇上龍船開行，往鎮江。：：將軍馬（按指馬三奇）、織造曹（寅）、中堂張（按指張玉書），公進御宴一百桌。織造曹進古董等物。上收玉杯一隻、白玉鸚鵡一架。又揚州府鹽商進古董六十件，又進皇太子四十件。各憲亦進皇太子古董物件不等。：：：隨賜督、撫、學院、鹽院各詩字不一等物。

十五日，皇上登舟開行，往蘇州。」

【註三七】：沈三白《浮生六記》〈浪游記快〉。

【註三八】：李斗《揚州畫舫錄》卷六《城北錄》。

同年五月回鑾返京時，皇帝又在揚州住了六天，《聖祖五幸江南全錄》中也記了一些實況，如：

「初一日，皇上……已刻至二十里舖，有江寧織造兼鹽院曹帶領揚州鹽商項景元等，叩請聖駕。午刻，御舟到三岔河上岸，進行宮遊玩，駐蹕御花園行宮。眾商加倍修理，添設舖陳古玩精巧，龍顏大悅。……進宴演戲。

初二日，兩淮鹽院曹進宴演戲。

初三日，皇上在行宮內土堆上觀望四處景致。上大悅。隨進宴演戲。

初四日，上即在行宮內荷花池觀看燈船，進宴演戲。

初五日，……文武官員晚朝，進宴演戲。

初六日，晚朝，進宴演戲。」【註三九】

根據以上資料，不難看出皇帝在揚州的多彩生活情形。然而事實上，康熙皇帝在六次南巡當中，前幾次在揚州的停留時間較少，活動也是比較正常與嚴肅的。後來由於鹽政大官與鹽商加入接待，又興建了寶塔灣行宮，皇帝與宮眷們在揚州的活動便不同了，尤其最後兩次的南巡，他們都在揚州前後勾留了十二天左右，每天除處理一些公務之外，都是遊山玩水，接受紳商們的進獻古董、玩器與書畫。特別是每天晚上，不是「演戲擺宴」，就是「看燈船」、「看煙火」，一直熱鬧到深夜。皇帝不但改變了一向維持的儒家夫子聖人的形象，地方官紳們則費錢費力的迎逢，造成可怕的後遺症。

乾隆皇帝的南巡，據說是遵照他祖父康熙時代的規定行事的，即所謂「適率我皇祖成憲」的。不過乾隆帝比他祖父好大喜功，南巡的場面必不比康熙末年的為差，應為可信的事實。儘管《南巡盛典》這類官書中記載乾隆帝在揚州只是到各寺廟進香，到鹽商的私家花園遊覽，觀光當地名勝古蹟，為園林廟觀題詩與匾額等等，即使舉行宴會也簡略的記載：「宴扈從王公大臣並江南督撫官員。」看起來沒有什麼特別。不過皇帝南巡不是輕車簡從的少數人，以船隊來說，就有一千多隻首尾相接。隨行的官員也常在千人以上，他們每次要徵用民船四百多艘，每到一地住宿也要占用民房四五百處，因此皇帝若要「宴

【註三九】：《聖祖五幸江南全錄》收錄在晚清時人汪康年所編的《振綺堂叢書初集》中，雖不著作者姓名，但汪氏所稱「自是隨扈人員」，應屬可信，因為書中所記各事、地點、時間都與官書吻合，可靠性很高。

扈從王公大臣並江南督撫官員」的話，至少也得開「御宴一百桌」。同時揚州的菜肴精美，加上鹽商的富有，御宴的飲食必定是上等的，難怪後來有人說乾隆皇帝非常欣賞揚州的飲食，即使返京之後，仍然是「每飯不忘揚州」【註四〇】。

乾隆南巡期間，揚州一地官民向皇帝進獻古董、書畫的風氣也很盛行，連清代官書中都記述這類的事。如乾隆二十二年第二次南巡時，皇帝在二月十三日離開揚州之際降諭說：

「沿途進獻詩賦書畫人員，進一冊者，賞緞一疋，進二冊者，賞緞二疋。其進萬壽生生圖之羅學旦，及進蘇詩補註之查開，各賞緞四疋。」【註四一】

又如乾隆三十年春間第四次南巡揚州時，皇帝也命令給予江南進獻詩冊入選之程晉升等十四人各賞緞一疋【註四二】。民間所進獻的書畫古董固然不少，但是地方官為皇帝準備的古玩陳設更是花費的大宗。乾隆皇帝自己也了解這件事，他曾經說過：「所有各處行宮內，從前皆陳設玩器，此等物件，或係假借應用，或用重價購買。」【註四三】揚州古董市場會因為鹽運官員「但求物真，不計價巨」的搜求而價格大漲【註四四】，甚至有說鹽政官員與鹽商為乾隆南巡每項在「玉貢銀」一項上就需要幾十萬兩的預算。可見南巡給揚州一地的經濟災難也是很可觀的。

《聖祖五幸江南全錄》中記載了康熙皇帝連日「進宴演戲」或「奏樂演戲」的事，可見康熙帝是酷愛戲曲的。事實上他在返京以後，還下令叫江南製作樂器的高手周萬謨進京，並派人到江浙地方購買過造樂器用的上等竹料。另外蘇州織造李煦也曾在一份奏報中說道：「今尋得幾個女孩子，要教一班戲送進，以博皇上一笑。」【註四五】乾隆時期專記南巡事的《南

【註四〇】：湯殿三《國朝遺事紀聞》第一冊《高宗南巡遺聞》。

【註四一】：《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五三二，葉二十四上。

【註四二】：同上書，卷七三三，葉二上。

【註四三】：《南巡盛典》，卷一《恩綸》。

【註四四】：鄭燮《鄭板橋外集·尺牘·枝上村奇米舊山》。

【註四五】：《李煦奏摺》頁四（北京中華書局版，一九七六年）。

巡盛典》中顯然隱諱了皇帝在這方面愛好的事，在揚州聽戲的若干記載也就不見諸官方書檔了。然而在乾隆南巡同時代人的著作中有不少談論此事的，如李斗就寫過如下的文字：

「天寧寺本官商士民祝釐之地。殿上蓋松棚爲戲台，演仙佛、麟鳳、太平擊壤之劇，謂之大戲，事竣即卸。迨重寧寺構大戲台，遂移大戲於此。兩淮鹽務，例蓄花、雅兩部，以備大戲，雅部即昆山腔。……」【註四六】

天寧寺之所以爲乾隆皇帝喜愛駐蹕之地可能與演大戲有關。誠如錢泳在當時所記的：「梨園演戲，高宗南巡時爲最盛，兩淮鹽務中尤爲絕出。」【註四七】「鹽務中尤爲絕出」是因爲鹽商們組成了戲班子，如徐尚志的老徐班、洪充實的大洪班、江廣達的德音班、春台班以及黃源德、張大安、汪啓源、程謙德等人也各有戲班，結果使得「蘇班名戲淮揚聚」了，蘇州劇曲高手來揚州住在一條專住名伶的「蘇唱街」，可見來人之多。鹽商們又招聘文人名家來揚州專門製曲，大家「朝拈斑管，夕登氍毹」，連鹽商們自己也多精諳工尺了。巡鹽御史更在揚州設局修改曲劇【註四八】，因而一時揚州戲曲大盛，當然這都是與乾隆南巡有關的。

清帝南巡揚州的吃喝玩樂，加上鹽官鹽商的刻意迎逢，在揚州形成了一些風氣，乾隆時的作家就有了這樣的看法：

「近日縉紳先生又有三好，曰：窮烹飪、狎優伶、談骨董。三者精，可以抵掌公卿矣。」【註四九】

身爲皇帝的康熙與乾隆，他們當然知道「禮尚往來」的道理的。除了對侍衛、船夫與一些小官吏役偶作獎賞外，對於進獻書畫古玩的人也給予緞疋、衣物、御書墨寶或殿本刻書的回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對鹽官、鹽商的「酬答」，他們的出手不同於對一般的其他官民，而影響日後的也很大。現在就作一些深入的說明：

【註四六】：李斗《揚州畫舫錄》卷五《新城北錄》下。

【註四七】：錢泳《履園叢話》卷十二《藝能》。

【註四八】：以上各事請參閱梁章鉅《浪跡叢談》卷二《小玲瓏山館》；嘉慶《江都縣續志》卷六；李斗《揚州畫舫錄》卷五；林蘇門《續揚州竹枝詞》等書。

【註四九】：阮葵生《茶餘客話》卷八。

(一)在康熙時代有賞借鹽庫銀的事實，庫銀或「帑本」借給鹽商，利息較市面上貸款低很多，這是對鹽商作生意有大幫助的。同時又有「舉庫帑以借捐輸」的事，鹽商捐款可以先從鹽運衙門庫房中借出，再分期攤還，也就是鹽商們可以以政府的公帑來捐輸，包括接待皇帝的費用在內。更重要的是康熙皇帝在南巡之後，又讓鹽商們在兩淮行鹽區內抬高鹽價，以增加收入【註五〇】。鹽商花費在招待皇上的費用，結果有很多又從用鹽的人民大眾身上收回來了。最後還有一點，就是康熙皇帝為鹽務官商們南巡接駕的勤勞與捐助銀兩很是感動，乃以「議敘加級」或「賞以虛銜」來作為對他們的答謝。例如「給曹寅以通政使司通政使銜，給李煦以大理寺卿銜，給李燦以參政道銜，通州分司黃家正：加二級。台州分司劉日輝、淮安分司金浩林……各加一級」。其中曹寅、李煦、李燦等人確是因為捐銀建寶塔灣「盡心公務，各自勤勞」的關係【註五一】。另外揚州當地的鹽商也在皇帝詢問曹寅後，了解他們捐銀多少而「議奏給以虛銜頂戴」【註五二】。結果不少鹽商得到了奉宸苑卿、按察使或其他六品官的虛銜。

(二)乾隆南巡期間也同樣給予官員與鹽商們不少好處。第一次南巡在到達揚州之前就先降諭說：

「……今兩淮商人，踴躍急公，捐輸報效，地方官一應公務，俱於此取給……甚屬可嘉。著加恩各按其本身職銜、加頂帶一級，以示朕恤商之至意。」【註五三】

皇帝一行在揚州小住三天之後，於乾隆十六年二月十六日登舟往鎮江，行前皇帝又下命令說：

「……前因兩淮商眾，踴躍急公，業已加恩優獎，更念其運綱輸課，接濟民食，恤商施足以惠民，特行再布殊恩，著將兩淮綱鹽食鹽，於定額外，每引賞加一十觔，不在原定成本之內，俾得永遠霑受實惠。……」【註五四】

【註五〇】：散見《李煦奏摺》頁二八、二三八、二五二等處。

【註五一】：《關於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頁三十（北京中華書局版，一九七五年）。

【註五二】：同上書，康熙四十五年閏四月初五日奏摺。

【註五三】：《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三八二，葉十二下。

【註五四】：同上書，卷三八三，葉一下。

由此可見：當時的揚州鹽商不但得到了經濟上的實惠，同時也有不少人得到了政治上名位，可謂升官又發財。乾隆二十七年第三次南巡，皇帝也給了官員與鹽商們一些「酬答」。在到達揚州的時候，即二月十二日，他發出一道諭令說：

「朕此次南巡，所有江浙二省辦差文武各官，任內罰俸住俸降級之案，俱著加恩准其開復。其無此等參案件者，著各加一級。……」【註五五】

在天寧寺行宮裡住了三天後，皇帝又於十四日頒降了三道諭旨，其一是賞給一些鹽商官銜的：

「朕此次南巡，所有兩淮商眾，承辦差務，皆能踴躍急公，宜沛特恩，以示獎勵，其已加奉宸苑卿銜之黃履暹、洪徵治、江春、吳禧祖，各加一級。已加按察使銜之徐士業、汪立德、王勗，俱著加奉宸苑卿銜。李志勳、汪秉德、畢本怒、汪燾，著各加按察使銜。程徵啓，著賞給六品職銜。程揚宗、程杓、吳山玉、汪長馨，俱著各加一級。」

其二是加賞鹽引成本的：

「兩淮商眾，現已加恩優敘。更念該商等銷引辦課，歲額通完，而於承辦差務，尤能踴躍急公，深堪嘉予。著再加恩，自壬午綱為始（按指當年乾隆二十七年），綱鹽食鹽，每引加賞十觔，不在原定成本之內，以二年為限，庶民食既定，而商力亦紓，用示恤商愛民之意。」

其三是照顧煮鹽灶戶的：

「朕此次南巡，省方問俗，翠華所過，慶典時行。念兩淮灶戶，僻處海濱，生計殊為艱苦，所有從前帶徵未完折價銀九千餘兩，著加恩一體豁免。」【註五六】

以上只是部分實例，但在在都是說明「加恩」給鹽商的，而地點又都在揚州，可見皇帝確實被揚州官商的招待「感動」了，不得不奉還給他們一些「厚禮」。

【註五五】：同上書，卷六五四，葉十四下。

【註五六】：以上三諭記載於同上書，卷六五五，葉十八至十九。

從以上的敘述，我們不難了解清代官書的記事是不夠詳盡，有時甚至是多方保留、或作溢美之詞的。就以清帝南巡揚州一事來說，皇帝前後在揚州的活動就記述得簡略，尤其對他們在揚州的宴遊生活以及收受玩器等物幾乎是隻字不提。即使是對鹽官與鹽商們的賞賜，也像是與鹽務官商花巨金「辦貢」無關，只是皇帝皇恩浩蕩的表現而已。另外，在上述的事實中，似乎也透現了一個訊息，即清帝南巡的紛華靡費，並非始於乾隆之世，康熙皇帝已經是散財童子，向鹽官鹽商輸送利益了。康熙皇帝是始作俑者，他開其端，乾隆皇帝壯其流，變得更加可怕就是了。

至於兩位皇帝南巡揚州，對當地的功過是非，我有幾點個人的看法：

第一，由於清朝皇帝的多次造訪揚州，古城在官商民眾的合力建設下，不斷的「治河渠、平道路、修橋樑、繕城郭」，使得市容變美了，市貌更新了。加上富商、官府與僧人又在城裡城外大修園林，由城市擴展到湖山，爭得「揚州以園林勝」的地位，與蘇州、杭州齊名，成為當時中國的著名大都市。除了硬體的建設之外，揚州在皇帝的提倡與獎勵下，軟體的進步也是極為可觀的。例如書籍的纂刻與珍藏：揚州在康熙至乾隆間刻印的書籍很多，著名的有曹寅主持的《全唐詩》、馬曰瑄、馬曰璐兄弟監刻的《經義考》、《漁洋山人感舊集》等等，都是版本學家公認的珍本。《佩文韻府》也是在揚州編纂的。至於藏書，除天寧寺有《古今圖書集成》與《四庫全書》外，吳氏測海樓以及阮元的家藏也是有名的，而乾隆時代馬曰璐的小玲瓏館「藏書百樹，多達十餘萬卷」【註五七】，最為時人羨慕，有「橫陳圖史常千架」的美譽【註五八】。

又如古物的保存與收集：乾隆時代的鄭板橋曾經對當時揚州的古董市場作過如此的描述：「世人癖好骨董，近日揚州此風愈盛。都轉廬公（按指兩淮鹽運使盧見曾），雅善考究此道，但求物真，不計值巨。進者既多，骨董成市，懿歎盛哉！盧公門下，英才羅列，碩彥如林。：夏商之鼎，秦漢之尊，淳化之帖，定州之窯，宣德之爐，成化之瓷，甚至斷碑殘碣，廢銅爛鐵，破瓷碎玉，如龍宮斗寶，一齊羅列眼前，摩挲觀賞。主人讚嘆，座客稱奇，大老題詩，名公賜跋，一經品題，身價百倍，于是乎骨董之值更昂矣。：：：上有所好，下必效之。超等之物，歸於超等之家，次等之物，轉入次等之手，不脛而走，

【註五七】：全祖望《鮚埼亭文集》（叢書樓記）。

【註五八】：袁枚《小倉山房詩文集》卷二十七，〈詩集〉。

永無遺棄，骨董盛行，骨董商之腰纏乃富。」【註五九】李斗也在《揚州畫舫錄》中提過：從清初到乾隆末年，活躍於揚州的書畫古物家多達一百多人，揚州當地名收藏家中如汪恂的金石字畫藏量在東南地區首屈一指。巴慰祖則金石最多。鑾江項氏爲「彝鼎圖書之富」者【註六〇】。另外，張氏容園收藏古物也多，「書畫鼎彝，隨時更易」【註六一】。而江春的園林中則「每逢午日，堂齋軒室，皆懸鍾馗，無一同者，其畫手亦皆明以前人」【註六二】，可見其珍藏之富。當然以上所舉只是犖犖大者，相信已足以說明揚州當日古物風靡情況的一斑了。

他如文風與文人的並盛：兩位文士型的帝王到揚州，賜官紳御書墨寶，爲寺廟園林作對聯立碑，即興書寫詩文，巧改名勝古蹟名稱，這些風雅行徑，必然影響到揚州人民，特別是文風原本就相當盛的揚州人民。乾隆南巡期間，又獎勵文學，特頒「恩科」，授以功名，更進一步的促進人才的興起。加上當地藏書豐富，社會各界又對學者禮敬有加，所以乾隆之世及稍後，揚州的經學研究大興，且成就非凡。「自蘇、常外，東南郡邑無能與比焉」【註六三】。在如此有利的學術研究條件之下，難怪揚州一地的進士總人數高達三百四十多人，而「揚州學派」也應運而生了。

此外，清帝的南巡對揚州戲曲的進步、烹飪的精美也都有提升的作用，這些也給「古來英麗」的揚州又增添了內涵，使揚州成爲了當時全國的文化重鎮。

總之，清帝的南巡揚州，對古城的發展，對古城知名度的增高，確實是有正面與肯定幫助的。

第二，儘管清朝皇帝在南巡時都說：「一切應用之物，俱備自內府，」或是「一切行宮道路諸費，俱係官爲經理」，他們也許是真的不想「苦累官民」的；但是事實上民間還是所費不貲。以揚州一地而言，建塔造屋、進呈珍玩、演戲擺宴、修

【註五九】：鄭燮《鄭板橋集》〈尺牘·枝山村寄米舊山〉。

【註六〇】：李斗《揚州畫舫錄》卷二〈草河錄·下〉及卷十五〈岡西錄〉。

【註六一】：黃鈞宰《金壺浪墨》卷一，〈鹽商〉。

【註六二】：阮元《廣陵詩事》卷七。

【註六三】：劉壽曾《傳雅堂文集》卷一〈溥宦夜集記〉。

橋鋪路，各種費項，為數極多。官員與鹽商們在「金錢濫用比泥沙」之後，都會出現虧空的現象。曹寅於康熙年間在揚州接待皇帝，除捐銀造塔、造行宮、進古董、進御宴、進戲曲等以外，又被皇太子等強行需索，結果造成幾十萬兩帑銀的虧欠而抱恨終生。李煦也同樣的發生虧空，連皇帝都為他們設法補充【註六四】。乾隆時的情形更是嚴重，兩淮鹽政普福、高恆等人，竟為了皇帝南巡「辦貢及預備差務」，虧欠鹽引繳貯運庫銀四百多萬兩，加上鹽商欠銀合計超過一千萬兩，約當全國當時國家年歲收的三成，結果鹽政與鹽運使被殺的多人，其餘小官貶官的、充軍的也有不少，造成乾隆中期的著名大貪案【註六五】。鹽商中也有因為皇帝南巡而「報效」得傾家蕩產的，如上述普福、高恆的虧空大案中，鹽商們竟欠繳鹽引等款達六、七百萬兩，這筆「商欠」中顯然是有不少與「供應」、「饋送」皇帝有關，案發後皇帝下令要他們按期償還，並將從前賞給鹽商們的奉宸苑卿銜、布政使等銜，全部革去。乾隆以後，由於淮鹽積弊太多，裁撤根窩，作鹽法制度上的大改革，鹽商獲利大不如前，加上政府以抄沒鹽商家產來抵還虧欠以及鴉片戰爭與太平天國等兵災影響，揚州鹽商不是兵火餘生，就是家資罄盡，「豪富甲於天下者，絕無其人」了。連靠鹽商生活的很多其他行業的人也失去依恃，所謂「一時富商大賈頓時復為貧人，而倚鹽務為衣食者，亦皆失業無歸」，即是指此【註六六】。由此可知：清帝南巡對國計民生都有影響，而對於鹽政制度的破壞，南巡也應該是原因之一。

第三，如前所述，康熙與乾隆時期，不少官員因在南巡中「工作勤勞」或是「捐輸報效」有功，皇帝都給予他們升官或其他獎賞，實際上這根本是一種政治利益的輸送，這對吏治與官場風氣是有害的，阿諛鑽營的風氣必然會因此而更盛起來。尤其是賞給鹽商們官銜，雖說是虛銜，但也令鹽商們羨慕不已，於是捐官風氣大盛，特別以捐作無刑名錢穀之煩的鹽場大使的人為多。李斗曾記：揚州城北買賣上街有官房十間，號曰「十號公館」，都是鹽務候補官的官邸。有些候補官還支領「坐薪」，數目也相當的高，據說到道光以後，兩淮鹽務官員中設分司大使及佐雜等官名額僅三十多個，而候補者竟有一百多

【註六四】：請參看俞玉儲《曹寅四視淮巖略論》（《揚州研究》——江都陳軼群先生百齡冥誕紀念論文集）頁五九三（一九九六，台北）。

【註六五】：請參看拙著《清史論集》頁一八七（乾隆彌貧研究）（東大圖書公司，一九九七年，台北）。

【註六六】：金安清《水窗春嘯》卷下（改鹽法）。

人，因而「中飽之蠹窟穴其中」，致兩淮鹽務日亦敗壞【註六七】。

第四，世間萬事萬物都是有盛衰起伏的，揚州的繁華也是一樣。從人事方面看，自盛清以後，再沒有皇帝南巡揚州了，當年「文人寄跡，半於海外」的景況不見了，所謂「揚州客聚如繁星，揚州客散如浮萍」【註六八】，揚州少了各方專才的推動，發展的力量沒有了，逐漸落後衰退是可以想見的。在景物方面，乾隆以後，清朝本身已步入中衰之途，加上其後的鹽法改制，兵禍頻仍，使揚州的園林古蹟都失去了昔日的光彩。「華麗曲折，疑爲蓬萊」的瘦西湖區，到鴉片戰爭前夕，則是「荒田茂草已多」了，後來隨著更多園林的廢圮，讓人有「樓台也似佳人老，剩粉殘脂倍可憐」的慨嘆。

揚州的城市與文化，隨著清朝的衰微而經歷了滄桑；但是清帝南巡給揚州帶來的一些不良風氣與影響，卻不能很快的隨著清朝與清帝走入歷史而消失。早在明朝初年，揚州的民風算是淳樸的，「室廬佩服，無大文飾」【註六九】，人民安分工作，婚喪交際也崇尚節儉。明朝中葉，大批鹽商來到揚州，帶來奢侈風氣，本地人也「華麗相競」，「好宴游，徵歌逐妓」了【註七〇】。不過爲時不久，古城在明清交替戰亂中，遭逢到重創，「舊商亡竄失業者半，鹽策凋耗」【註七一】，人民生活必然因之歸於平淡簡樸了。經過清初幾十年的休養生息，清帝的南巡以及鹽、漕運作有利於揚州的諸種原因，揚州又再見繁華了，人民生活的窮奢極侈亦如官商們接待帝王的氣派，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種習氣，正如虧空的官員與鹽商一樣，人民也無論有無資產都揮霍成性，習以爲常了。有人「家無升斗之儲，外披宴粲之服」【註七二】；有人「一日所獲，只供一日酒肉」【註七三】。表面上「猶恐千金揮不盡」，事實上是「內實空虛而外事奢靡」的充闊人物而已【註七四】。

【註六七】：王振忠《明清徽商與淮商社會變遷》頁一三三（三聯書局，北京）。

【註六八】：見《孔尚任詩文集》第二冊卷六《廣陵聽雨詩序》及盧見曾《雅雨堂遺集》卷下《長歌行》。

【註六九】：嘉慶《揚州府志》卷三《巡幸志三》。

【註七〇】：魏禧《重建平山堂記》（《平山堂圖志》卷九《藝文》）。

【註七一】：嘉慶《揚州府志》卷四《宦迹三》。

【註七二】：桂超萬《宦游記略》。

【註七三】：光緒《續修甘泉縣志》卷十九《藝文》。

安於逸樂的人往往會遠離生產行列的，揚州人在清帝南巡後有不少以「吃酒看牌爲事」的，也有以聽書看戲或閑居茶肆爲樂的，更糟的是一些年輕人被聲色貨賄誘惑，竟有「膏沐妝如婦人」的【註七五】，這種風流餘韻，一直到民國以後還存在，朱自華就因爲不滿這些現象才改名「自清」，改號「佩弦」，據說他就是想用《韓非子》的典故來鞭策自己，示警同鄉的【註七六】。

揚州市民在皇帝受大家迎逢以及鹽商可以不事生產而坐享厚利的影響下，也養成了不勞而獲的趨利性心態。人人「年年思想做財翁」【註七七】，因此古城中敬財神的香火終年不絕，而財神廟宇隨處可見，又有到廟中「借元寶」的風俗，「以紙爲鈔，借一還千」【註七八】，充分反映了好利的心態。

綜合言之，清朝皇帝的南巡揚州，固然催化了揚州的經濟發展，人文興盛，也提升了揚州的知名度。但是清朝官場風氣與鹽政制度的敗壞，似乎也多少與清帝的南巡有關，而揚州古城原本樸實的風俗與人心，顯然也受到了腐蝕的影響。

【註七四】：董偉業《揚州竹枝詞》。

【註七五】：陸舜《廣陵賦》：「……粉傅何郎，春薰奉倩。……膏沐妝如婦。」

【註七六】：潘寶明《揚州名勝》頁二一〇（一九九四年，揚州）。

【註七七】：同註【註七四】。

【註七八】：李斗《揚州畫舫錄》卷一《草河錄上》。

**A Brief Study of the Impact of Visits to Yangchow  
by the Manchu Emperors  
Chen, Chieh-hsie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Yangchow has long been a famous city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The K'ang-hsi and Ch'ien-lung emperors of the Ch'ing dynasty made a total of twelve visits that had a profound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impact on this ancient city. First, their intensive visits helped to elevate the appearance of the city, especially in terms of landscap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gardens. Their visits also served to stimulate culture and art, which led to Yangchow becoming an important cultural center at the time. Second, the enormous expenses for construction, road repairs, theaters, banquets, and rare curios created huge deficits for the mandarins as well as merchants of the city. Third, the emperors rewarded local officials and salt merchants with political and financial favors that in turn encouraged corruption and favoritism, and thus undermining the salt distribution bureaucracy. Fourth, the emperors' lavish lifestyle created a negative example for the local subjects, who adopted the attitude of seeking profit and living in luxury. In conclusion, visits by the Manchu emperors promoted economic development, cultural prosperity, and popularity of the ancient city of Yangchow, but they also eroded its original simplicity and reservation.

Keywords: Manchu 滿族  
Yangchow 揚州  
K'ang-hsi 康熙  
Ch'ien-lung 乾隆  
mandarin 官  
salt-merchant 鹽商

---

\* The Chinese text of this article appears on pages 一一 through 三二.